

Yi Studies Ethnic Imagin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Reflec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holarship
on Yi Studies in China

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现代彝族研究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通过聚焦于单一民族来分析我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的著作。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它填补了现代彝族研究学术史的空白，尤其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评论中有重要建树。

民族想像与 学术选择

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 著



人民出版社

Yi
Studies

红河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民族想像与 学术选择

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版式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ISBN 7 - 01 - 005584 - X

I. 民… II. 李… III. 彝族—研究—大理白族自治州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035 号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MINZUXIANGXIANGYUXUESHUXUANZE — YIZUYANJIUXIANDAI XUESHUYUEJIANLI

李 列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 - 01 - 005584 - X 定价：36.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122524 65250042

作者简介

李列，男，彝族。民俗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彝族学术史、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在《云南社会科学》、《民族文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主要论著有《美学与美育》（合著）、《素描彝族原始宗教的图像世界》、《现代彝学的建立与学术转型》、《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彝族主位研究：以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例》、《学术中国化思潮与现代彝族研究》、《“施教”与“治夷”：凉山彝族调查报告研究》、《现代期刊与现代彝族研究》等。

在研究领域上，追求深度和广度，利用自己的地域优势，对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和民俗进行研究和田野作业，获得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Ethnic Imagin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Reflec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holarship
on Yi Studies in China

Yi Studies

Ethnic Imagin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Reflec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Scholarship
on Yi Studies in China

本书是作者对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反思，也是对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的思考。作者认为，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民族想象的基础上，学者们选择了不同的学术路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传统。本书通过对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反思，探讨了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之间的关系，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民族想像与 学术选择

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Yi Studies

责任编辑 贺畅

平面设计

艾菁设计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巴莫曲布嫫

国际彝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并且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性“显学”,但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清理其学术发展轨迹即“总述创获,彰明源流”的学术史。李列博士的新著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以“学术转型”为关节点,以梳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过程”为主线,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维度上,以“他观”与“自观”为研究主体在学术视野和叙事话语上的双向统合,从“印象之学”到“事实之学”,从现代民族主义背景的宏通观照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有效地将发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彝族研究及其间纷纭复杂的历史变革与社会思潮、人物和事件、著述和观点汇聚为一个步步深进的学术阐释空间,其中既有“史”的透视,又兼有“论”的引申,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做出了系统的清理,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论评中形成了如下多方面的突破:

一、在资料学的发掘上:该著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期刊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深细的发掘和爬梳,广泛搜求了大量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文本和成果,首次重点考证了彝族研究学术史这一特定领域在特定时期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全面梳理了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彝族研究作为(汉语)学术资源的特殊优势与发展空间,以探寻丰富和

发展这一学术传统的创新途径。应当说,彝族研究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民族研究从初创到发展的一个缩影。该著从资料学这一基础性环节上,为族别研究的学术史写作,提供了深掘学术资源的一个范例。

二、在方法论的架构上:该著作为一种“史”的叙事性阐释,作者首先以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框定自己的“工作方法”,即如作者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所概括的“研究几位学者”、“突出一个‘团体’”、“分析一个时段”、“选择两个视角”,以实现全书的工作目标。作者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举凡民族与国家、西学与国学、边疆与边政、国难与学术、官员与学者、师承与治学、他观与自观等,都是关系到现代学术之建立及其走向的关键问题,贯穿着作者对这段时期学术深进的历史思考,如“四川省政府施教团”的考察,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事件阐释的理论力度,并藉此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彝族研究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在其发轫和开创阶段的学术史之全景,也为引领、补阙和完善我国彝学学术史构建了一种可资参照的工作框架。

三、在研究主体的观点上:该著首先选择了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等近二十位彝族问题研究的大家,其中既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又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对这些有着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经历的学者及其治学道路的叙述和分析,探讨他们在借鉴西方学术理论与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两方面的经验和局限,从而勾勒出现代学术史某些复杂的社会情境、个性化的学术实践,以及群体性的研究布局。进而作者转向本民族的知识精英与社会中坚,以岭光电和曲木藏尧为案例,从比较的角度,直面有着不同学术视野、不同文化身份和不同学术诉求的研究主体与学术行为,在“他观”与“自观”的双向互动中,结合学术访谈讨论了主客位研究的知识谱型与实践策略,即使是对“局内人”的考察也贯穿着不同社会角色与不同个性化实践的成因分析,从中究问学术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图式和研究视野的多重变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所选对象,基本覆

盖了中国彝学研究乃至现代学术研究中无法绕开却又因种种原因被“遗忘”或“淡忘”了的重要学者,并提供了大量翔实而生动的实证资料,这便更为全面而系统地从研究主体这一知识生产的重要环节突显出中国现代彝学研究及其学术格局。

在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彝学已经成为一个既跨学科又相对独立的国际化研究领域,这在该著所及的论域中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之,各地彝学机构和学会组织也是一种现实存在。因此,就“现代学术的建立”而言,作者聚焦于“彝族研究”,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彝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化的史路历程。

作为首部在彝族研究这一跨学科领域中的治史之作,其学术难度和挑战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彝文文献与汉文史料方面之遗珠、相关学者的师承关系、治学道路及其评价定位、学术史的反思与学术精神的重构等有待商榷、充实或完善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从全书来看,或许是过于注重“时间”与学术史之间的对应关系,作者在材料的取舍和详略方面也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例如,马学良先生的《历史的足音》与《彝族经籍文化辞典》都是其晚期完成的重要成果,但与其“新学术之路”和前期研究不可或分,在“学术史”里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反映;再者,对于“中央研究院”在我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中的作用及其在边疆民族研究中的“国家行为”与学术群体之形成的相关讨论尚显薄弱。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该著不仅第一次为我们系统描绘了中国现代彝学从发端到发展的全景,更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反思的系统参照和评价体系,从而为国际化学术格局中的中国彝学研究及其研究范式的转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谓“功莫大焉”。

总之,这种开展系统性、阶段性的族别研究学术史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该项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推进中国彝学、国际彝学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都会提供有益借鉴。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彝族研究	6
第一节 民族主义背景与彝族研究	6
第二节 被想像的边缘群体	15
第三节 1928 年以前彝族研究的基本估价	21
一、“上帝的使者”——传教士	22
二、旅行家的“探险”	26
三、中国学者研究的“误区”	30
第二章 杨成志的彝族研究：转型与开拓	39
第一节 杨成志西南民族调查的背景	40
第二节 独驱瘦马向寥廓	49
第三节 杨成志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围	59
第四节 杨成志在彝族研究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64
一、彝族研究的立场：政策与学术统一	65
二、彝族研究的方法：实地调查	73

三、彝族研究与多学科学术关系的建立	77
四、彝族研究的基础：语言	81
五、彝族民间文艺：“生活真型”	85
本章小结	90
第三章 彝族研究的国家行为：宣慰教化	99
第一节 考察边区和凉山的团体	102
第二节 国民政府施教措施和目的	111
一、关于施教与民族同化	111
二、民国时期川滇黔地区彝族教育概说	118
第三节 四川省政府边区施教团及《雷马屏峨纪略》	129
第四节 施教团考察彝区的立场及意义	131
一、施教——彝区实地调查与研究	131
二、施教——文化权力的渗透	140
三、施教——“化内”与“化外”	147
本章小结	155
第四章 林耀华的彝族研究：学术与方法	160
第一节 学术中国化与彝族研究	160
第二节 学术方法叠合的彝族研究	172
第三节 学术实践的前沿：地方个案与族群文化研究	177
一、《凉山彝家的巨变》：半个世纪对彝族的关注	178
二、《凉山夷家》：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	192
三、彝族研究方法的自觉追求和实践	203
本章小结	212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彝族研究：民族与救亡 215

第一节 民族救亡与学术取向 216

第二节 救亡运动中的彝族研究 223

第三节 彝族研究学术机构与学者 228

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李有义彝族经济
研究 229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等的
彝族研究 234三、华西坝内迁大学的彝族研究——徐益棠彝族
宗教研究 246四、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岑家梧彝族艺术
研究 251五、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江应梁彝族社会
制度研究 260

第四节 现代期刊与彝族研究 268

一、研究西南民族期刊概述 268

二、期刊特点及对彝族研究的推动作用 274

本章小结 291

第六章 马学良的彝语研究：以俗释经 296

第一节 彝语研究综述 299

第二节 沉潜民间 拓荒之路 310

第三节 走出书斋 挽救“天书” 317

第四节 语言学：研究彝族民俗文化的基础 323

第五节 以俗释经：典籍研究与民情礼俗 332

第六节 纵横比较：多种方法的语言研究 337

第七节 四行译法：彝文古籍翻译的典范	348
本章小结	353
第七章 本土学者的彝族研究：自观位的视角	358
第一节 边疆政治的特殊形式：土司	360
第二节 岭光电和《保情述论》	365
第三节 曲木藏尧和《西南夷族考察记》	372
第四节 彝族精英与彝族社会	382
一、家族名望与政治权利相结合	384
二、家支背景形成的特殊关系网	388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391
第五节 寻找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396
第六节 重构历史革除弊政的各种尝试	402
第七节 彝族精英的言说方式和民族认同	410
本章小结	416
结束语 问题与思考	419
一、彝族研究的转型与学术地位的确立	419
二、民族主义背景下的彝族研究	427
三、彝族研究中的“文化权力渗透”	431
四、彝族研究中自观（emic）他观（etic）位的 视角	436
五、彝族研究的承续与发展	447
主要参考文献	453
后 记	464

绪 论

民族生存的基本方式，一是凭借一定的自然环境占有一片独特的自然空间；二是创造体现本民族特征的文化空间；三是与其他民族以各种方式并存。在亲和、适应大自然以及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各民族在彼此交往与并存过程中形成维系民族群体延续和发展的独立社会与文化标识。

彝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少数有文字和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与认识彝族不但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本书主要是对1928—1949年的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尽管至1950年在民族识别中对多支系群体作“整合”、“归并”才有了“彝族”整体的称谓，但是对彝族主要支系的研究却已经在这之前形成了气候。因此，本书着眼于民族研究的实际，系统地审视现代彝族研究的学术渊源和视角特点。

在彝族研究史上，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研究成果，一直被忽略其在彝族研究史上应有的地位。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历代统治者和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彝族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给彝族研究带来了很大影响，要对彝族进行系统科学地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期没有专门的彝族研究学者，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不多，研究领域比较狭窄。这种对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检讨显然是不够深入的。毋庸置疑，生活于中原社会格栅之外的“四夷”被统治集团描画为徘徊于兽性边缘的野蛮人，这

确实会影响到彝族研究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但彝族研究的繁荣与沉寂，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统治集团的治边举措和民族观念的分野。对现代彝族研究的学术探讨，我们既要考虑统治集团治边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行上的种种差异等实际原因；也要考虑这一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环境等多重社会历史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抗日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段；更要考虑中西学术交流背景下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合力对彝族研究的推进作用。彝族研究的学术之路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我们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是彝族研究的开创时期，也是第一个丰收期。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徐益棠、江应梁、岑家梧等学者和彝族本土学者岭光电、曲木藏尧等积极参与，学者们以新的立场和方法，改变了以前以外国人研究为主的局面，开辟了彝族研究的良好途径，为研究彝族留下了丰厚成果。此外，政府组织的多次彝区考察团，也留下了大量调查材料和报告。我们发现，这些著述和报告尽管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对于彝族既有实在的描述也有遥远的想像，彝族始终被当作“另一个”，而彝区也被看成是“另一处”。基于此，本书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梳理二十世纪前半期彝族研究的学术史；二是梳理的目的是要探讨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彝族研究的学术地位是如何被确立的，彝族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义究竟在哪里。

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民族识别创建并制度化了彝民族。在讨论彝族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等问题时，本书沿用生活在西南地区具有明显的共性和差异性的许多族群，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时多支系被“归并”后的“彝族”概念，不对各个支系的特征和支系间的区别进行讨论，即只讨论在“彝族”概念范围内的“同一性”学术研究的流变轨迹。在本文中出现的“倮倮”、“罗罗”、“緦緦”、“夷族”、“撒尼”等词语，均沿用学者研究报告中的旧称，皆指识别后的“彝族”。

在“界定”了彝族研究范围和内涵的前提下，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凉山彝族。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彝族支系都具有氏族残余、氏族外婚、父系家族同居、房屋行幼子继承、姑舅表优先婚等学者们归纳的多种习俗。多支系呈现的文化特质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学者们根据凉山彝族诺苏文化来描绘的彝族代表形象。在民族识别中，诺苏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成了识别彝族的原型。

凉山区域为元明清时代的马湖区域，《读史方輿纪要》（卷73）记马湖府的地界说：“东至叙州府四百十五里，西至建昌行都司越嵩卫六百里；南至乌蒙府界百四十五里；北至嘉定州犍为县界二百里”。马湖之名，晋时已有之，《华阳国志·蜀志》记越嵩郡有马湖县，“水通夔道入江”。唐以为羁縻州，元代始设治置土司，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马湖路总管府，分其地置六长官司：雷波、泥溪、平彝、蛮夷、夷都、沐川；明初改为马湖府，设平山县及平彝、蛮夷、沐川三长官司；清设马边、雷波等厅；民国初年改设为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即俗称为雷马峨屏境，也就是小凉山境。自此以西到西昌邻接地带就是一般所称的大凉山境。东面南面隔金沙江与云南省邻接，北面有大渡河，自古以来是汉彝的分界地。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诺苏是彝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大小凉山地区。诺苏彝族和其他彝区及彝族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

从政治形式来看，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地区从未形成过系统的国家政权形式，只有土司形式，历史上虽在凉山地区设过府、郡、县等，但几乎名不副实，名存实亡。到二十世纪初，凉山地区除少部分地域控制在少数土司手里外，多数地区是被无数家支分割占有。

从社会制度来讲，地处封建制包围之中的凉山彝族地区，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行民主改革止，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

凉山彝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他彝区不同：凉山彝族社会仍处在奴隶社会阶段时，与诺苏不同，云南、贵州和广西的绝大部分彝族则直接或间接地生活在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与汉族的交流、融合，他们的社会经济形式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尤其是生活在滇越铁路沿线的彝族，为现代锡矿公司工作的彝人则和汉族一样，已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凉山彝族和其他彝族在习俗上也有很多不同：诺苏禁止平表通婚，实行交表优先婚，等级内婚，从父居，男性幼子继承权，转房制度，父子联名制和火葬，他们没有统一的宗教，既不信佛教，也不信道教或儒教。毕摩和苏尼为宗教祭师。他们有自己的节日，最隆重的是火把节和阴历十月间的彝族年。^①其他的彝族则在许多方面与汉族相似。他们不实行等级内婚，转房制度和火葬。尽管他们的习俗仍与汉族有区别，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信仰道教，实行土葬，并和汉族一样，庆祝汉族人的节日。

除社会制度、经济形式等方面凉山彝族和其他彝族有区别外，凉山彝族还有其特殊的地位。历朝政府虽剿抚并用，但“夷祸”难平，汉人势力从未真正深入凉山。政令不行，形同化外之邦，故外人称之为“独立保保”。

显然，历代政府治理“夷祸”、办理“夷务”主要是指凉山彝族而言。很多学者、探险家、考察团对彝族的研究和实地调查，基本也是围绕着凉山彝族展开，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徐益棠、张云波、江应梁等以及之前和之后的学者或官员，研究大小凉山彝族，既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取向，也是历史潮流所驱，更是由于大小凉山彝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在本书中，所选择学者的研究取向在凉山彝族，本书对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也是

^① 曾昭抡说“云南境内的保保，大部分汉化程度已深，原来风俗习惯，可说荡然无存……至于宁属境内，以及川省的雷马屏峨，则迄今大部分保持固有状态，就中尤以凉山为甚”。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上海，求真社，1945年版。

以凉山彝族研究为中心。虽然不具备全面性但却因此而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所以本书中并没有包含所有关于彝族研究可能的话题，也会遗漏研究中的一些学者和有关资料。尝试把彝族研究放在具有鲜明特色的学者研究个案中，目的是凸显论者的问题意识，透视不同社会语境和学术思想状况下，学者的问题意识以及表达问题的方式，讨论彝族研究学术转型与学术地位确立的过程中的诸面相，揭示被淹没或压抑的各种可能性，特别关注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处于“自观”位和“他观”位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彝族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倾向和态度，更想作进一步思考的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彝族本身的自我意识、汉民族对彝族的想像、学者个人的才情机遇等多重因素胶合一起而表达出来的“国家问题”，在所有问题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要线索，极力确立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的介入对学者研究视角和界域的影响。或者我们这样来设问：这些学者，为什么会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方法，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彝族的族源、称谓、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

本书所涉及的民族学、民族史、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及民族问题、边地问题、教育问题、边疆开发经营等问题，择其主要成果和某些专题作跨学科的综述而不进行学科内涵的纵深研究。